

东亚易学：源起、特征及发展趋向

林忠军

摘要 东亚是一个地缘政治和文化的概念。东亚易学起源于中国，在东亚诸国传播之后，不断展现其发展的同步与连续性、思想方法的相似性及其本土化过程中呈现的多样化。东亚易学研究以东亚易学为研究对象，整体反思东亚易学所取得的成就，探讨东亚易学内在逻辑关系、解释方法与思想的一致性、本土化过程、发展趋向等问题。东亚易学的特点是传承与发展、一体化和多元化并存。东亚易学研究应跳出狭隘的民族意识，以更为开放的宽广视域，客观理性地对待东亚诸国易学。随着国际性学术交流互动，当今东亚易学个性化、本土化特征越来越不明显，东亚诸国易学交叉研究新格局已经形成，一体化特征日益凸显，但也存在基础研究尚未完善，宏观研究未受重视，新的研究方法有待探索等问题。这些也是东亚易学研究的重点和新方向。

关键词 中国易学 东亚易学 一体化 多元化

作者林忠军，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曲阜师范大学东亚易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山东曲阜 273100）。

中图分类号 B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4)06-0021-10

DOI:10.19862/j.cnki.ssyk.000872

当今东亚易学研究大部分停留在基础研究层次，如东亚易学断代史个案和易学人物或著作个案研究，成果丰硕，还有如中国古代易学断代史研究、象数或义理史研究、日本易学断代史研究、韩国易学断代史研究等；而宏观研究东亚易学的成果则寥寥无几。在中国大陆较早研究东亚易学的是杨宏声，他曾撰《本土与域外——超越的周易文化》，以日本、朝鲜传统易学为视角，首论东亚易学的传播与发展，但论之比较简略。中国台湾学者陈威璠则较早地将日本江户儒家易学研究视角“置于东亚儒学的框架下，将《周易》视为中日两国的共同经典”，以期能“提供与中国《易》学对话的空间”，展开日本儒家易学研究，“作为东亚研究之一环”。^① 他是最早以东亚为视角研究日本易学的学者，为研究东亚其他国家易学提供了典范。香港中文大学吴伟明近期撰写的《东亚易学史论：〈周易〉在日韩琉越的传播与影响》，是当今海内外学界研究东亚易学的新作。吴伟明在该作中以国际化的视域和客观理性的态度，通过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东亚诸国易学的发展历程及特征，提出了“东亚易学圈”概念，是真正宏观研究东亚易学的先行者。然而，许多问题仍有待深入思考和探讨，如现有研究更多着眼于东亚诸国易学比较，而对东亚易学宏观问题的研究过于简略。基于此，笔者就东亚宏观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学界。

一、何为东亚易学

东亚，原本是日语翻译出的词语，本指亚洲东部或亚洲，是地域性概念，但它又是一个地缘政治和文化的概念。这里所说“‘东亚’一词，既不能将其归入纯粹的地理概念，也不能将其理解为政治学概念。而是

^① 陈威璠：《日本江户时代儒家〈易〉学研究》，台北：政大出版社，2015年，第443页。

将东亚视作一个‘文化东亚’的概念”^①。作为文化概念，它是通过反思和批判日本“东亚”地缘政治概念而形成的，它以中华文明为轴心辐射周边地域，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而又多元化的亚洲文化共同体，“它涵指以中国为起源的文明这一广泛地域的‘共通性’的地域内部所存在的多元文化形态”^②。其中，汉语是东亚文化形成的最基本要素，用汉语写成的著作是东亚文化最基本的典籍。通过理解和解释用汉语写成的经典，而形成了东亚共同的思维方式、思想意识、价值观、心理结构等，是为东亚文化。东亚文化起源于中国，历史上由于地域相邻，日本、琉球、韩国、朝鲜和越南等接受了汉语言，源源不断传播中国文化，曾以相同的语言和诠释方法探讨中国文化典籍，从而形成了东亚共同文化。东亚主流文化是儒学，即东亚儒学，“所谓‘东亚儒学’这个研究领域，既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应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③，“它并不是（或不只是）以上各地域儒学传统的机械性组合而已，它既展现‘发展的连续性’，又呈现‘结构的整体性’”^④。东亚儒学，作为一个整体，不仅是“发展的连续性”“结构的整体性”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他们共同诠释的儒家经典、一致不二的经典解释方法和共同关心的价值之问题，这是东亚儒学之所以称为东亚儒学之关键。

在东亚文化圈中，《周易》是儒家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典籍，备受东亚学者关注和推崇。经过东亚学者对《周易》文本的解释，易学成为东亚文化中的显学，构成了东亚共同探讨的学问，而被称为东亚易学，或称为东亚儒学圈中层次分明的“东亚易学圈”：

《周易》是汉字文化圈的共同智慧及文化遗产，从古至今在东亚文化的发展上均扮演重要角色。从易学在域外的流布与影响，我们可以构思亚洲曾出现一个以中国文献为中心的“易学文化圈”。这个文化圈共分四层：第一层在中心的是中国易学，是域外易学的基础。第二层最是接近中心的一层，日本及韩国易学在其中。它们不但易学水准甚高，而且发展出颇具自己特色的解说及应用，对中国及其东亚其他国家的易学带来一定的冲击。此外，日韩易学均反映本地化和本土意识，不应将它们看作为中国易学的海外分支。第三层次是越南。易学早已离开初阶，但未能全面开花结果。专家及著作不算多，多是发扬朱子学，创意及影响有限。第四层最外层，例子是琉球。虽然《周易》已算普及，但其学习仍未脱离初阶，没有成为一门学问。^⑤

这种易学文化圈划分，合理解释了东亚易学内在结构、比重及其一体多样性，但是无法呈现东亚易学连续性发展的特征。

东亚易学，自古迄今，不是中国易学的复制翻版和东亚诸国易学之简单组合，而是起源于中国、在他国传播之后，不断展现其发展的同步与连续性、思想与方法的相似性及其思想本土化的易学。因此，东亚易学研究是以东亚易学为研究对象，以整体反思东亚诸国的易学所取得的成就，探讨东亚易学形成原因、内在逻辑关系、解释方法与思想的一致性、本土化过程、发展趋向和价值等为其研究内容。由于易学在东亚的发展过程中本土化易学形成而出现易学多元化，东亚易学研究也包括东亚各国易学比较研究，通过不同国别易学家的易学和同一国别易学家的易学比较研究，显现出东亚诸国易学的特色，即呈现在共同观念前提下的差别性和个性。因而，东亚易学互动对话成为东亚易学研究的重要形式。基于此，东亚易学研究不是以中国的易学研究取代东亚其他国家的易学研究，更不是以东亚其他国家的易学研究取代中国的易学研究，而是以中国易学为线索旁及东亚诸国的易学研究。

东亚易学研究与东亚人的易学研究有着本质区别。就其研究对象而言，东亚易学研究是以东亚整体和诸国的易学为研究对象，其范围是东亚过去和现在的易学；东亚人的易学研究，是以易学为研究对象，其范围比较广，可以是易学文本研究，可以是东亚易学，也可以是东亚以外的易学，如欧洲易学、北美易学等。如果东亚人研究的是东亚易学，则属于东亚易学研究；如果研究东亚易学以外的易学，则不属于东亚易学。就研究者而言，东亚易学研究者不局限于东亚，可以是东亚以外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不管是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学者，凡是以东亚易学为研究对象，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皆可称为东亚易学。而东亚人的易学研究，研究

① 吴震：《东亚儒学问题新探自序》，参见吴震：《东亚儒学问题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页。

② 吴震：《代前言：关于东亚儒学问题的一些思考》，参见吴震：《东亚儒学问题新探》，第3页。

③ 黄俊杰：《自序》，参见黄俊杰：《东亚儒学：经典与诠释的辩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④ 黄俊杰：《“东亚儒学”如何可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⑤ 吴伟明：《东亚易学史论：〈周易〉在日韩琉球的传播与影响》，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第8-9页。

者是东亚人，不包括东亚以外学者。总之，东亚易学研究是以东亚人的易学研究为对象。凡是研究东亚人的易学研究成果，皆属于东亚易学研究。

二、中国易学在东亚的传承、发展及东亚易学形成

易学起源于中国。《周易》是迎合殷周之际神秘卜筮文化而成书，本为卜筮之书，经过孔子的整理和解释，《周易》成为“后其卜筮、观其德义”的儒家经典。自汉代始，易学一直是中国古代官学。汉代独尊儒术，《周易》因为孔子的整理与解释，而为五经之首，大道之原。南北朝时期，南朝以王弼易学为官学，北朝以郑玄易学为官学。隋唐北学并入南学，王弼易学一统天下。唐朝孔颖达奉诏撰修《周易正义》，取王弼、韩康伯注为之疏，成为唐宋时期科举考试的教材。宋以后，程朱易学被确立为官学，元代科举以朱子易学著作作为教材，明代胡广修《周易大全》和清代李光地修《周易折中》皆取朱熹《周易本义》、程颐《程氏易传》，旨在继承和解释程朱易学著作，确立朱子易学合法的学术和政治地位。在官方倡导和功利驱使下，以探寻圣贤之意为导向，理解与诠释《周易》文本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与道学、佛学及历代科技的互动中，中国古代易学历经汉代象数易、魏唐玄学易、宋明儒理易、清代考据易、现代易学之发展与演变。从方法言之，中国古代易学分象数训诂法和义理法，由于治易方法不同，易学分为象数、义理两派和占验宗、襍祥宗、造化宗和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之六宗。由于解《易》理路、方法之不同，形成了五彩缤纷、形态各异的易学思想，最终汇成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大易文化之流。近现代随着西学东渐，又出现了以科学治易和以易治科学，形成了新话语下的象数之学，即所谓的“科学易”。同时，以西方哲学、政治学、逻辑学、诠释学、心理学等解释《周易》，形成了新话语下的义理之学。新的易学文献出土，为解读《周易》经传和研究易学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出土易学文献研究、易学史研究和文献整理研究，是中国易学亮点。^①

固然，易学发源地在中国，易学研究的主流和易学解释的话语权也在中国，然而，当易学源源不断地传入东亚诸国，并且各国几乎保持了与中国同步的演进并按照自身话语系统探索时，易学和整个儒学成为全体东亚人的精神家园，易学理解和解释不再是中国学者独有的文化，而是东亚诸国学者共同的学问。易学不再是中国独有的精神财富，而是东亚诸国共同的精神财富。自中国易学在东亚传播，到东亚易学形成，经历了漫长时代。易学很早就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地传播。

自公元前1世纪中叶始，《周易》作为儒家典籍开始在朝鲜半岛三国传播开来。高句丽、百济、新罗先后设立太学，讲习包括《周易》在内的五经。其中百济还模仿汉朝设立了五经博士，接受了中国易学。新罗接受易学晚于高句丽和百济，在唐代曾派留学生到中国留学，学习易学和儒学。新罗统一了三国后，效仿唐代建立国学（后改太学监），从唐代引进《周易正义》作为学子学习和考试的教材。在儒家经典“三品”之外又设《周易》为“特品科”考试科目。受道学和佛学影响，新罗易学带有宗教色彩。此时，薛聪创立“吏读法”，以朝鲜语解读《周易》，在朝鲜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高丽取代新罗（918年），继承了前代儒学传统，高丽王实行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将包括《周易》在内的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基本内容，使易学成为“六斋”儒学之一。并设国子监，广建书斋、学社，置经学博士，包括易学博士。此时私学兴起，传授“九经”，包括《周易》。高丽末期，易学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从元代引进以朱子学为首的理学，朱熹、程颐易学成为当时的显学之一，其国学改称为成均馆，成为讲《易》的重要场所。朱子学传播始于李珠（颐正）。他在元代学朱子学，回国后几经传授，推动了高丽朱子学中易学派形成。此外，以四书和《春秋》注《易》在当时流行，图书之学和易学中的心性之学成为易学研究重点。在朱子易学派中，形成了郑蒙周（1337—1392年）的重义理不废象数的易学和郑道传（1337—1398年）为首的重变化的“勋旧派”。权近（1352—1409年）以图解《易》、辨儒佛之易学，在朱子易学研究中独树一帜。这为朝鲜王朝确立朱子易学为官学奠定了基础。^②

朝鲜王朝时期（1392—1910年），易学得到了空前发展，朝廷一改崇佛尊儒的政策，独尊儒术，《周易》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学习《周易》者众多，朱子学被确立为正统的思想。朱熹《周易本义》和

① 参见林忠军：《中国当代易学反思与重建》，《学术月刊》2023年第1期。

② 参见杨宏声：《〈易经〉在朝鲜的传播与朝鲜易学》，参见杨宏声：《本土与域外——超越的周易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127—135页。

《易学启蒙》成为此时最为重要的易学典籍。有“海东尧舜”之称的世宗，集合名儒二十人讲论《周易》，定《周易》为廷试科目之一。世宗还作《训民正音》，依照易学原理和《河图》创制新文字。此时期朝鲜本土化易学也已形成。退溪李滉（1501—1570年）作《启蒙传疑》，通过解释朱熹易学思想，创立“理数之学”。栗谷李珣（1536—1584年）作《易数策》提出的理体气用思想，将“穷其理而尽其变”作为治《易》宗旨。之后，朝鲜学术界出现了以李滉、慎后聃、丁若镛为代表的实学派和以尹鏼为代表的古学派。实学派注重考证方法和经世致用，接受了西学，将传统儒学与西学相结合形成新的思想。如金锡文作《易学二十图解》试图以易图象数解释西方天文学。李滉（1682—1764年）作《星湖僿说》重历史和考辨，除了探讨朱子易学外，他还善于以西方科学知识解释易学，创立了星湖派。其弟子尹东奎、慎后聃继承和发展了星湖思想。丁若镛（1762—1836年）作《周易四笺》《易学绪论》，秉承星湖学风，尊重西学，崇尚象数，发明读《易》四法，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易学家和思想家。尹鏼（1617—1680年）作《周易说》，重视文本和传统注易的方法。

由于受日本殖民和朝鲜战争影响，韩国近现代的易学一度几乎中断，研究者屈指可数。易学研究由易学本身研究转入易学与政治变革关系的研究，其易学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20世纪中后期，韩国易学研究开始复兴。自21世纪始，韩国进入了易学研究的一个深化时期。仅从2001到2015年，学术论文约有450篇，著作包括翻译书和专著，出版了150多种。从当今易学研究内容看，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远远超过古代，不仅涉及《周易》经传、《周易》哲学、中国古代易学家、韩国古代易学家、中韩易学比较研究、韩国易学史、易学断代史研究、出土文献研究，还涉及《周易》与管理学、精神分析学、符号学、政治哲学、书法美学、遗传信息等多元文化易学研究。^① 综上，韩国易学偏重宋易，尤其是对于朱子图书之学研究，成果丰硕。除此之外，其实学易也多有创新，呈现出朝鲜半岛的易学特色。

《周易》在日本的传播晚于朝鲜半岛。《周易》早期在日本传播是通过朝鲜三国时之百济完成的。据《日本书纪》载，继体天皇时期，百济贡五经博士段杨尔和贡五经博士汉高安茂，先后渡日，传《周易》；钦明天皇时百济五经博士王柳贵、易学博士王道良东渡传播经学和易学。据此推知，大约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周易》文化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另外，也有来自中国本土的《周易》文化在日本传播。大化改新（645年）以后，日本派到中国的僧侣、使者、留学生回国后带回许多《周易》注释著作，尤其是日本僧侣，对《周易》书籍和文化在日本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并成为当时易学研究中坚力量。他们坚信佛易相通，易理可助修行，形成了以佛解《易》之风。如留学僧旻是史料记载中较早传播《周易》的日本僧人之一。他在中国留学24年，除了学习佛教，还钻研儒家经典《周易》。回国后担任天皇顾问，常为他人讲解《周易》，他与高向玄理一同被任命为国学博士。^②

天智天皇（676）时，日本设立大学寮，大学寮皆以儒家九经为教材，其中易学取《周易》郑玄注、王弼注。奈良、平安时代，仿唐朝学制，所有当政者皆学习《周易》，天皇也从博士学《周易》。平安后期，藤原成传、藤原赖长为诸生讲解《周易正义》。

江户德川时期，日本易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朱子学成为日本的官学，朱熹的《周易本义》也受到日本官方的高度重视，日本江户时代宫内讲学，多次采用了朱熹的《周易本义》。根据学者统计，此时期的易学著作1082种，出自413个学者之手。^③ 重版的69种中国易学著作，包括了所有中国重要的易学注释，其中39种重版超过一次，朱熹《周易本义》重印达十一次之多，重印的易学著作多不因循中国原版，而是经由德川学者标点、注释、重编或校订。^④ 此时形成了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折中派、国学派等儒学派。

其中朱子学派主要通过传播和注解朱子易学，阐发易学思想。该派主要有两大系，一是藤原惺窝（1561—1619年）与他的学生林罗山（1583—1657年）及其后代一系。他们主要依据合并的《程传》和《本义》理解、解释程朱易学。林罗山与其子林鹤峰、其孙林凤冈三代习《易》，有多部著作出版。林罗山父子点校的《周易本义》成为此时官方教材。二是山崎闇斋（1618—1682年）一系，他反对将《程传》与《本义》合并，力图恢复朱子易学本义，其所编撰的《朱易衍义》被选为官方教材，他弟子众多，创立了“崎门学派”，成为易学研究重镇。其中佐藤直方、浅见綱斋和三宅尚斋为崎门三杰，易学研究最为出色。当然，此

① 参见郑炳硕：《近五十年韩国易学发展史之成果及述评》，《哲学与文化》2015年第12期。

② 王静：《〈周易〉在日本的早期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3月13日。

③④ 吴伟明：《易学对德川日本的影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21—22页。

派易学也有怀疑精神，如中井履轩对于《易传》作者质疑和《系辞》错简论证。

阳明学派以中江藤树（1608—1648年）和熊泽番山（1619—1691年）为代表，与朱子派比较，治易折中，新旧注兼采。中江藤树以《易》解释《中庸》《大学》和《孝经》。熊泽番山常用日本历史和政治解释《周易》，进而批评当时流弊。其易学有本土化的倾向。

古学派类似中国清代乾嘉学派，他们推崇汉唐注释，尝试以文字训诂、音韵和历史方法恢复《周易》文本的本义，质疑《易传》作者，对于朱子学派和阳明学派皆持批评态度，在文献整理方面有突出贡献，代表江户时代易学最高成就。古学派以伊藤家族三代（伊藤仁斋、伊藤东涯、伊藤兰嵎、伊藤东所）及其后学为代表，撰有易学著作十余部。太宰春台也是古学派极有创意的易学家，除了以文字训诂考据《周易》古义外，还重视易学的政治意义。

折中派是江户时代后半期的流行易学派别，他们起初追随古学派，注重文字训诂，旨在恢复古易，接近古学派，后又由怀疑到排斥古学之泥古偏执，并自由择取宋明诸家义理之说。因这种重古义而不泥古、训诂兼义理的治《易》方法，被称为“折中学派”，此派来自大阪者以中井履轩、中井竹下为代表，来自江户的有井上金蛾、太田锦城和其弟子海保渔村及佐藤一斋，来自京都的则是皆川淇园。

国学派，以平田笃胤为代表，以易学为日本神做论证，认为伏羲是日本神代的神祇，西渡中国教化民众。《易经》是日本神的杰作，批评文王、孔子将《易经》沦为儒典。^①其中新井白蛾（1715—1792年）是德川时代最为著名的易学家，他先学朱子派易学，后学古学派易学，治易特色是兼采古今易注，著有八部易学著作，其学生井上鹤洲著有五部易学著作。^②

现代的日本也有诸多易学者著书立说。笔者根据林庆章主编《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统计，从1900—1992年，发表论著508篇。日本学者的研究涉及易学各个领域，如《周易》经传研究、易学史研究、图书之学研究、《周易》思想研究、《周易》与其他学科研究、出土文献研究、欧美易学等。^③其易学起源、《易传》作者和思想、易学史、出土文献等研究均有很高学术价值。如内藤湖南、武内义雄、贝塚茂树、田口福司朗、赤塚忠等关于易学起源问题研究，田口福司朗、本田济、山下静雄、本田济、赤塚忠关于《易传》成书年代、作者、结构等的研究，铃木由次郎、小沢文四郎的汉代易学研究，今井宇三郎的宋代易学研究，户田丰三郎的易经注释史研究，武内义雄、坂野长八、内山俊彦的易学哲学思想研究，吉野裕子的易学与民俗研究，末本刚博的易学与逻辑学研究，池上嘉彦的易学符号学研究，河合隼雄的易学心理学研究等。^④

《周易》传入越南时间可能比较早，在公元前已经传入，但因为资料不详，无法确定具体时间。吴伟明根据以易学明世的东汉末虞翻曾被贬越南北部的交州（又称交趾）和善治郑玄易的三国名仕许慈也曾常年居住交趾，推知，东汉到西晋之间，《周易》已经传入越南。^⑤有的学者认为，在“北属时期”士燮（137—226年）担任交趾太守“初开学，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也许是在越南传播《周易》的“第一人”。^⑥10世纪，李朝（1010—1225年）仿中国，设立国子监与文庙，引进科举制度，开始印刷中国典籍，出现像宝鉴禅师一样精通易学的僧人。

越南陈朝（1226—1400年）引进中国科举制度设立国学院和五经博士，多次重印四书五经作为教材，四书五经是读书人必读之书。该朝易学研究有偏向义理的倾向。黎朝至阮朝前期，朱子学成为官学，《周易》备受重视。《周易》文本、邵雍先天之学、《程氏易传》和《周易本义》开始被译成喃文，为学者学习之用。程朱易学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解说《程氏易传》《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是当时易学研究的主流，还有康熙皇帝亲自参加编撰的《周易折中》《日讲易经解义》和惠栋《周易述》以及明代《周易大全》也是皇子和学者学习的重要书目。当时，出现了许多解释程朱易学的著作，如黎贵惇撰有《易经肤说》、范适贵撰有《易义存义》、汝伯仕撰有《易系解说》、范庭琥撰有《羲经窥测》《窥测问答》等，皆以程朱易学为宗旨。阮朝后期，易学与整个

① 日本江户时代易学状况，参见吴伟明：《易学对德川日本的影响》，第29—40页。

② 关于日本易学派的划分，参见吴伟明：《东亚易学史论：〈周易〉在日韩琉越的传播与影响》，第2—4页；长谷部英一：《日本〈易经〉研究概况》，参见《中华易学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易学大辞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91—901页。

③ 详见林庆章主编：《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1900—1992》，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3年，第73—128页。

④ 长谷部英一：《日本〈易经〉研究概况》，参见《中华易学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易学大辞典》，第891—901页。

⑤ 吴伟明：《东亚易学史论：〈周易〉在日韩琉越的传播与影响》，第139页。

⑥ 许氏明芳：《二十世纪以来越南的〈周易〉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第4页。

儒学开始转变。潘佩珠作《国文周易讲解》将《周易》翻译成用拉丁文注音的喃文，重印达十余次。还有吴必素用喃文注释的《周易大全》，也多次再版。黎文敬的《周易究原》，融中西文化，成为当时易学研究代表作。

1945年后，越南易学衰落。此时期越南不再使用中文，用越语翻译《周易》成为易学重要任务。由于战争的原因南北相隔，北越学术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研究《周易》成为北越主流。南越广泛接受了西学，以传统方法研究《周易》和西学相结合是研究《周易》的南越主流。因此，以中西结合研究《周易》成为此时期易学研究的特色，如阮献黎《易经：君子之道》是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易学研究，该作简略介绍中国汉代以后的易学发展，同时还总结西方对《周易》的研究情况。陶唯英《周易与辩证法》是以马克思哲学为方法的易学研究。阮有良《周易与东方宇宙观》和阮唯勤《周易玄解》《易学精华——中国哲学大纲》探讨了易学思维和哲学思想，也是易学哲学之作。21世纪以后，越南很重视《周易》研究，成立许多与《周易》相关的机构，如“河内周易俱乐部”“周易研究与发展中心”，河内师范大学和河内国家大学分别成立中国学研究机构，《周易》进入大学课堂，主要讨论《周易》成书、《周易》思想、《周易》与文化等问题，具体涉及《周易》与人生、《周易》与管理、《周易》与科学、《周易》与中医、《周易》与数学等。^①

由此可见，由中国发源的易学，以此为轴心，成辐射式、源源不断传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东亚诸国，经过东亚诸国学者对于易学文本的传承、解释和阐发，形成了绵延不绝的易学之流，呈现出易学发展的连续性，最终构成不同特质的、东亚人共有的学问——东亚易学，对于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哲学思维、政治制度、科技文化、宗教信仰、伦理价值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东亚易学一体化

整个东亚易学基本上与中国易学同步，是一个易学共同体，具有“思想内涵的相似性”特征，表现在东亚易学史上源远流长的解释和探讨《周易》文本所呈现出东亚共同的易学文本，相似的易学方法、易学思想和易学思维。受中国影响，各国在易学文本、易学基本问题、文本解释方法、易学思想和思维方法及其学派上，基本与中国保持同步，思想具有相似性。

（一）东亚易学文本完全一致。中国汉代官学《易经》十二篇，南北朝时期，南朝王弼易学，北朝郑玄易学；隋唐南北朝统一，孔颖达奉诏撰修的《周易正义》是官学；宋明时期程朱易学是官学，程颐《程氏易传》、朱熹《周易本义》成为宋以后科举教材；明代胡广等人取朱熹易学解释著作而撰修《周易大全》是明代科举的教材。传入朝鲜三国的是汉代《易经》，后来南北朝官学易也传到古朝鲜。新罗统一三国后，效仿唐代建立国学（后改太学监），从唐代引进《周易正义》作为学子学习和考试教材。高丽末期，从元代引进朱子学，朱子《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及程颐《程氏易传》成为当时易学遵循的典籍。从古朝鲜和中国本土传入日本易学文本，应该包括《周易》经传、《周易》王弼注和郑玄注。天智天皇时，日本设立大学寮，取《周易》郑玄注、王弼注为教材。奈良、平安时代，仿唐朝学制，以《周易正义》为教材。江户时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程氏易传》等是日本学习和解释的重要文本。越南大致也是如此。

易学文本校勘是中国易学传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战乱、抄录或某种政治原因等，流传下来的易学文本存在许多问题，如脱字、衍文、错简和编次等，因此，校订易文本是古代易学家在经典文本解释之前必须做的工作。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勘今文易与古文易、东汉白虎观会议校勘包括《周易》在内的经学文本，到唐代颜师古奉诏正定《周易》文本、宋代朱熹等儒者恢复“古《周易》”文本，再到清代阮元校勘《周易注疏》，校勘易学文本成为经典解释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易学文本流传到东亚其他国家的过程中，同样也会出现问题。如日本德川时代重版宋明易学著作很多。“重版多不依中国原版，而是经德川学者标点、注释、重编或校订。”^②如林罗山（1583—1657年）曾据宋版《周易正义》校勘明刊《十三经注疏》版的《周易注疏》，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海保渔村，他所著《周易校勘记举正》用《周易正义》行文习惯、文义和诸本文字三种方法订正了阮元校勘之误。又如韩国丁若镛于《易学绪言》中，列“郑康成《易注》论”“郭氏《举正》驳义”节，对郑玄易学文本和王弼、韩康伯、郭京易学文本进行校勘。越南潘佩珠作《国文周易讲

① 许氏明芳：《二十世纪以来越南的〈周易〉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第14—16页。

② 吴伟明：《易学对德川日本的影响》，第22页。

解》将《周易》翻译成用拉丁文注音的喃文，翻译时，曾对比中日《周易文本》，也属于校勘学范畴。东亚易学使用文本和对文本校勘活动是一致的。

(二) 东亚易学经典解说形式一致。东亚易学研究大部分采用注、传、解、疏、说等形式，探索经典的本意和阐发其思想，如韩国李退溪《易学启蒙传疑》、张显光《易学图说》、丁若镛《周易四笺》，如日本伊藤东涯《周易翼通解》等。同时，中国易学史上出现过许多集解性的易学著作，如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宋代李衡《周易义海撮要》、朱鉴《朱文公易说》，清代李光地《周易折中》等，东亚各国也有此类著作，如韩国朴昌宇《周易传义集解》、徐明膺《易学启蒙集笺》，日本山崎闇斋《朱易衍义》以《周易大全》为基础取《朱子文集》《语类》汇集朱子易学，泊园书院的《周易辑疏》汇集中国汉唐至清和日本江户时代130多种易注。^①

(三) 东亚易学解释方法一致。易学基本问题是象数义理关系，因为对于这个问题解释不同，决定了易学解释的方法和路数趋向。就方法而言，中国古代易学大致上是象数兼训诂方法、义理方法。由于使用方法不同，大致上分为两大派，即象数派与义理派，当然也有折中象数义理派。日本基本上沿袭中国易学的传统，日本皆重视象数、义理方法。以象数治易，如佐藤一斋（1772—1859年）《周易栏外书》广采中国古代易学众家之说，“主要的解《易》方式，乃是近于汉代象数《易》，采用互体、爻变、飞伏等《易》例以推象通辞，再以之作为义理之根据”^②。太田锦城（1765—1825年）《九经谈》《周易象义》推崇汉易，重考据，反对宋易，有象数之倾向。以义理注《易》，如伊藤仁斋和伊藤东涯主张《周易》分为卜筮易和儒家易，虽然对待卜筮义理易关系理解不同，但皆主张作为儒家的《周易》为义理之书^③，有义理之倾向。

朝鲜半岛治易很早就有义理和象数之分，“在《高丽史》中，有关于禹倬最早引入程伊川的《易程传》加以研究的记录。这说明程伊川的义理易学被正式地加以研究。在高丽，研究宋代象数易学的学者有白文宝（1303—1374年），对邵康节的先天象数学加以讨论”，“从高丽末期到朝鲜前期之间的《周易》研究倾向，随着朝鲜王朝的开创，在确立统治理念的过程中，强调基于性理学之形上学的道德实践，体现了更重视义理易学的倾向。然而，越到朝鲜中期以后，象数易越来越向宇宙和自然认识的领域扩大其范围”。^④ 丁若镛提出推移、互体、爻变、物象之象数四法，以此注《易》，属于古朝鲜后期象数派。

就其派别而言，南宋朱子弟子众多，其易学薪火相传，绵绵不绝。当朱子易学被确立为官学之后，利益所使，宋代以后的易学研究，主要围绕朱子易学展开，传播、解释和阐发朱子易学，达到鼎盛，成为中国易学主流，研究朱子易学则称为朱子学派。古代日本和朝鲜受其影响，崇尚朱子学，确立朱子易学在政治上的地位，朱子易学研究蔚然成风，形成朱子学派。越南虽然未形成朱子学派，但其易学研究主要研究朱熹易学。晚清，中国易学形成了以恢复汉学易为宗旨、以考据为内容的乾嘉易学，之后，随着西学东渐，易学家接受了西方思想，形成了新易学。中国易学形成了传统易学与现代易学对峙的局面。受其影响，朝鲜有实学派。朝鲜学术界出现了以李瀾、慎后聃、丁若镛为代表的实学派和尹鏼为代表的古学派。实学派接受了西学，将传统儒学与西学相结合形成新的思想。日本有类似中国清代乾嘉学派的古学派、折中派，以恢复《周易》本义为宗旨，注重文字训诂、音韵和考据，反对宋代易学。19世纪，西学传入日本，日本学者以易学解释西学，探讨易学与西学关系成为一种思潮。越南也是如此，如黎文敏以西方自由思想、君主立宪、科学和宗教解说《周易》，是越南新易学代表人物。

(四) 东亚易学讨论问题一致。如宋明时期，自欧阳修质疑《易传》作者之后，关于孔子与《易传》的关系，成为易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到清代、近现代，基本上否定了孔子作《易传》的说法。古代日本中井履轩、内藤湖南、伊藤仁斋、伊藤东涯、田口福司朗、本田成之、山下静雄、本田济、赤塚忠等学者，与中国学者一样，通过考证，大胆提出《易传》非孔子所作。朝鲜王朝时期李瀾认为，《序卦传》为后人作，非孔子作，丁若镛也以大量事实证明《易传》不完全是孔子之作。受康有为影响，李炳宪否定伏羲画卦文王作辞，认为孔子是《周易》作者，托古设教。

① 王鑫：《日本近世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129页。

② 陈威瑀：《日本江户时代儒家〈易〉学研究》，第183页。

③ 参见王鑫：《日本近世易学研究》第二章、第三章，第38—95页。

④ 郑炳硕：《近五十年韩国易学发展史之成果及述评》，《哲学与文化》2015年第12期。

同时,中国易学在义理方面的太极、理气关系问题是宋明时期谈论的主要问题,高丽朝末期注重义理,如以郑梦周为首的以《易》与《春秋》相互表里,以郑道传为首的强调易之变化。朝鲜王朝李退溪秉承朱子易学,主张太极与理两个词可以互换,是一个基本概念的不同表达,为万物之本。太极是理,阴阳是气。二者不相离不相杂。“退溪和当时另几位大学者如奇大升、李栗谷、李一斋、成浩原诸人在太极与阴阳关系问题上,都继承朱子的观点,而各人在理解上略有不同。”^①日本以藤原惺窝、林罗山、山崎闇斋为代表的朱子学派主张理气二元论,以伊藤仁斋和东涯为代表的古学派和以徂徕为代表的古辞学派,主张气一元论。“不管这些儒者是否以朱子学继承者自任,都可以看到《周易》乃是他们甚为重视的武器,而这同时也可以说是中国理气论问题的延伸与拓展。”^②

图书之学是中国古代易学讨论的主要问题。与中国类似,日、韩、越等国家学者,也主要讨论这些问题。易图解《易》,始于高丽末期权近以《大学》《中庸》等典籍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绘制许多图表,形成以图解易的风格。古代朝鲜因为崇尚朱熹,其《易学启蒙》成为研究图书之学最基本经典。“导入朝鲜的象数易学的主流不是汉代象数易,而是以河洛和先天八卦图等易图为中心的图象学之象数易学。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以《易学启蒙》为中心的朱子的图书象数易学。构成《易学启蒙》内容的河图洛书、先天图和后天图的图像,作为朝鲜时代象数学论议中最重要的核心观点和逻辑而起作用。由此,《易学启蒙》被视作以朱子性理学为中心展开学问争论的朝鲜儒学者们的必读书。”^③影响最大的是李退溪,其作《启蒙传疑》,成为古代朝鲜研究图书之学的重要成果,其学问也被称为“理数之学”,不仅影响古朝鲜,也传入日本,对于江户时代传统易学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日本藤原惺窝三传弟子室鸠巢《太极图述》和榭原篁洲《易学启蒙谚解大成》,通过解读传入日本的朱熹易学著作和李退溪阐释朱熹易学的著作,阐发朱子学象数学。皆川愿《易原》作图像达三十余篇,既有与中国图书相关的八卦、四象图、列著图、音律图、九筹图,还有与五音相关形形色色的易图,是一种融音律、易学为一体的图像易学。^④

综上所述,东亚易学从时间上看,中国易学传入东亚诸国后,随着中国与东亚其他诸国易学文化交流深入,东亚诸国易学研究进度基本上与中国易学研究保持着同步;从研究内容看,东亚诸国易学研究对象、易学研究方法、探讨易学问题等情况,体现了东亚易学一体化。这是东亚易学之所以可能超越东亚某一国易学而成为独立一体存在之关键。毋庸置疑,东亚易学起源于中国,受中国易学影响形成和发展,中国易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赋予东亚易学动力,中国易学在东亚易学发展过程中占有主导作用。但是,不能因此无视东亚其他诸国为东亚易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简单地以中国易学研究取代东亚其他诸国的易学研究,贬低其他诸国的易学。

四、东亚易学本土化与多元化

东亚诸国的易学,在接受了中国易学之后,一方面,按照中国的易学文本、易学方法、路数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立足于本土所处的历史境遇和文化发展,在易学文本具体解释和理论建构上不断突破中国易学,逐渐打上了地域的痕迹,朝着个性化发展,展现东亚易学多元化特征。如新罗朝薛聪发明“吏读法”,以朝鲜本土语言解释易学,朝鲜易学开始本土化。李朝时世宗作《训民正音》,依照易学原理和《河图》创制新文字,此时期朝鲜本土化易学也已形成。徐敬德(1489—1546年)崇尚张载和邵雍思想,其易学融合了张载气学理论和邵雍象数思想,建构了不同于中国、有朝鲜特色的气学哲学。李退溪的易学,虽尊崇朱子,却对文本性质、经传关系、程氏易评价等有自己的见解^⑤,而他对于朱熹《易学启蒙》的理解,不完全同意胡方平、韩邦奇等人解释,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其所用文献“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尤其是他毫无顾忌地引入阴阳家诸书以言《易》,更打破了纯正易学家的禁忌”^⑥,成为富有朝鲜特色的本土易学标志。茶山丁若镛秉承星湖学风,通过对于中国汉唐宋元明清易学的反思,崇尚汉学象数,发明读易四法(推移、

① 吕绍纲:《退溪易学初论》,《周易研究》1998年第4期。

② 陈威璿:《日本江户时代儒家〈易〉学研究》,第350页。

③ 郑炳硕:《近五十年韩国易学发展史之成果及述评》,《哲学与文化》2015年第12期。

④ 皆川愿:《易原》,日本宽政五年本。

⑤ 参见吕绍纲:《再论退溪易学》,《周易研究》2003年第1期。

⑥ 金生杨:《退溪对朱子象数易学的发展》,《尤溪首届朱子文化研讨会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374—390页。

物象、互体、爻变)，建构以四法为核心的象数体系。其推移说，本之于中国古代卦变说、移易说，但又有修正。互体本之于中国，却也有新意。其对于筮法行著的解释，完全出自个人的理解，异于中国宋代程迥和朱熹，成为东亚易学一家之言。就图书之学而言，朝鲜半岛以图解易蔚成风气，除了阐释朱子图书之学外，他们还从天人一理出发，提出了人易，以命为太极，以心貌为两仪，以四事（言、听、视、思）为四象，以八情（喜、怒、哀、惧、爱、恶、欲、敬）为八卦，以谦、德、圣、严等表述人的词为六十四卦，建立了仁义为核心的人易体系，还绘制了与人相关的性命、心易、相貌等易图^①，成为心性理学的符号，发展图书之学。

日本“中世易学反映日人将中国学问本土化的初步尝试。日本元素透过易类汉籍的标点与和训（用日语来读中文）及日人撰写的易注疏加进易学里。……日人的易注疏多以日本历史及文化为例解说，日本的佛教、神道及阴阳道的成分在这个过程中渗入易学里”^②。德川时期易学更为突出，“德川易学有浓厚的日本本土味道，和训与使用日本历史和德川现状作例子的解说进一步加强易学日本化”^③。如德川前期的伊势的神道家度会延佳（1615—1690年）、吉川神道的吉川惟足（1616—1694年），融神道、理学、易学为一。儒学者如林罗山、中江藤树（1608—1648年）等^④，其中山崎闇斋将朱子易学“理一”与神道融为一体，将神代说与《太极图》《太极图说》万物生成理论、《洛书》数理相融合，证明了神道与儒道一致不二，故闇斋易学体现了本土化地方特色。又如日本古学派中的太宰春台，除了早于清中叶的易学家以文字训诂考据《周易》古义外，还立足易学史视野，就易学“正”“反”深入探讨重要的问题，提出“《易》本起于数”“易则河图而作”“《易》之道在于象数”，易之失，始于汉末，乱于晋宋。他批评了王弼韩康伯易学以老庄为本、程颐易学专讲义理，而对朱熹易学，春台先认同了朱熹“易为卜筮之书”观点和《启蒙》明象数、经传分离古易文本、以象占分离注经的做法，反对朱熹以“理一”和以理气心性一家之言解释《系辞》。同时，他还探讨易学与政道关系，主张“凡治天下国家者必知易道”，将《易》“时”“数”“阴阳”学说用之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中。其易学“正”“反”学说和落实到社会的应用之中，是易学研究的创新。^⑤与象数相关的训诂学日本也有创新，如日本皆川淇园作《周易绎解》，运用声韵学解释《周易》，建立易学“开物学”，“淇园的原创性不仅在于结合《周易》与汉语声韵学两者，还在于他几乎将《周易》原有的脉络尽数扭转，以达成其建立自身体系的目的。……淇园所展现出的对抽象思维的敏锐程度，以及运用《周易》资源来建构自身体系的原创性，仍然使得他值得被记上一笔”^⑥。

越南易学也有自己的特色，不像古代朝鲜和日本敢于批评朱子易学，他们一直尊崇朱子易学，重视实用，包容性高，与本土文化融合。如黎朝阮秉谦作《周易国国歌》，将《周易》译为喃文，并融合道教、佛教与宋易，将易学宗教化。黎贵惇撰有《易经肤说》正面肯定以朱子为代表的宋易，指出了朱子易学的贡献，以及与邵雍易学的差别。在此基础上，以易道为治理国家原则，用之于国家和社会改革。琉球易学不如日本、朝鲜，没有易学专家和易学著作，停留在易学传承阶段，缺少创建，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易学。故易学作为经书研究微不足道，而在算术、宗教、建筑和医学等方面，确有很大影响，成为本土文化重要部分。

五、东亚易学发展趋向

综上所述，东亚易学特点是传承与发展、一体化和多元化并存。传承是指中国易学传到东亚诸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承中国易学成为东亚诸国易学的主流。发展是指经过一段传承之后，东亚诸国按照自己的理解，建立了不同于中国的易学体系。一体化是指东亚易学受中国的影响，在易学文本、易学基本问题、文本解释方法、易学思想和思维方法、学派等方面与中国相似。在时间上，关于易学研究进度，各国基本上保持同步。多元化，是东亚易学在接受了中国易学之后，立足于本土所处的历史境遇和文化土壤，在易学文本具体解释和理论建构上不断突破中国易学，提出新的观点，并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展现出自己的特色。东亚易学研究是对东亚易学形成、发展演变的反思，通过比较东亚诸国易学，探讨东亚易学共性和本土化的个

① 参见成以心：《人易》，成允信：《人易卦爻》，朴万琼：《心易》等。成均馆大学编《韩国经学资料集成》《易经》第13册，1996年，第311—706页；21册，1996年，第1—230页；31册，1997年，第193—416页。

②③ 吴伟明：《易学对德川日本的影响》，第14、154页。

④⑤ 王鑫：《日本近世易学研究》，第23、102—122页。

⑥ 陈威璿：《日本江户时代儒家〈易〉学研究》，第351页。

性,思考东亚易学在世界文明互鉴中未来发展的趋势。因此,东亚易学研究,是东亚乃至世界共同的学问,研究者应该跳出狭隘的民族意识,以更为开放的宽广的视域,客观理性地对待东亚诸国易学。不能以一国易学研究取代其他国易学研究,无视或否定其他国易学发展及其创新性。既要关注东亚易学整体性研究,也要正视东亚诸国易学个性及其对于东亚易学所做出的贡献;更不能因为重视整体东亚易学研究,而贬低中国易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和东亚易学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随着国际性学术交流互动,当今东亚易学个性化本土化的易学研究越来越不明显,以中国易学为中心的东亚易学研究传统逐渐被打破,诸国易学交叉研究新格局形成,东亚易学一体化特征日益凸显。关于韩国古代易学、日本古代易学,韩国和日本是研究的重镇,而在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学者专门研究日本、韩国的易学,如吴伟明、王鑫、陈威璿等的日本易学研究,杨宏声、赖贵三、张悦等的韩国易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当然,中国易学仍然是东亚易学研究关注的重点,如帛书《周易》研究,中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研究的重镇,而在日本、韩国及欧美国家也不乏其人。就其方法而言,当今东亚易学研究,除了使用传统研究方法外,还借鉴西方哲学研究方法,如在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日本、韩国皆有用西方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心理学研究易学者。

总之,从目前易学发展看,可以说是东亚易学研究方兴未艾,因而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值得关注:首先,东亚易学基础研究还未完善,未有完整的中国易学史、韩国易学史、日本易学史、越南易学史等,这类基础研究影响东亚易学整体研究。因此,总结东亚易学研究成果,继续推进东亚易学基础研究,是当下易学研究一个重点。其次,当今东亚易学研究大部分停留在孤立的国别个案易学研究,缺乏历史的、宏观的研究视域,将东亚易学作为整体,通过比较,宏观探讨东亚易学的形成、发展、特征、价值仍然是当今和未来易学方向。最后,过去是用传统方法研究东亚易学,推动东亚易学传承与发展,功不可没。然而,随着中西文化融合,以传统方法研究东亚易学已经不能满足学术发展需求,而以新的方法研究东亚易学方兴未艾,借助于中西方文明互鉴,吸收西方知识文化,以现象学、心理学、解释学、符号学等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东亚易学,重构东亚易学体系,将成为东亚易学研究的新方向。

(责任编辑:盛丹艳)

Discussion on the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East Asian Yi-ology

LIN Zhongjun

Abstract: East Asia is a geo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cept. East Asian Yi-ology originated in China. After the spread of other countries, it continued to show the synchronization and continuity of its development, the similarity of its ideological methods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ts localization process.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Yi-ology takes East Asian Yi-olog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reflecting on the achievements of Yi-ology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as a whole, exploring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East Asian Yi-ology, the consistency of interpretation methods and ideas,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ast Asian Yi-ology. East Asian Yi-ology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Yi-ology is different from the Yi-ology study of East Asians.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Yi-ology should jump out of the narrow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reat the Yi-ology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objectively and rationally with a more open and broad horizon. Nowadays, with the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 East Asian Yi-ology, the personalized and localized Yi-ology research is becoming less and less obvious. A new pattern of cross-study of Yi-ology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has been formed,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ast Asian Yi-olog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t present, the basic research of East Asian Yi-ology is not perfect, and the macro research of East Asian Yi-ology has not been paid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Yi-ology with new methods is on the rise. Therefore, it is the focus and new direction of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Yi-ology to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basic research, the macro study and the new methods of East Asian Yi-ology.

Key words: Chinese Yi-ology, East Asian Yi-ology, integration, diversification